



敦煌文化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 赵声良

100多年前，由于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敦煌文献的流失，敦煌文化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敦煌文化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经过100多年的研究，敦煌文化中蕴含的各方面的价值不断被挖掘出来。敦煌文化涉及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尤其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之上中华文化与诸多外来文化相互交流、互鉴，并不断创新发展的历程，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敦煌文化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广泛接受外来文化，并不断创新的典范。

敦煌文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其中莫高窟规模最大，现存洞窟735个，其中有壁画和彩塑的有492个。保存了4—14世纪的古代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二是莫高窟藏经洞里发现的大量古代文献及其他文物，总数达7万多件，包含了5—11世纪的宗教、历史等极其丰富的内容。三是敦煌地区的历代文化遗迹及考古发现的各类文物，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古代遗址、古墓葬以及简牍、画像砖、陶俑等各类出土文物。敦煌文化遗产不仅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而且在1000多年间，每个时期都有大量的文物保存下来，构成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反映了中华文化

明持续发展并与外来文化广泛交流的悠久历史。

敦煌石窟持续1000多年的营建，把中华文明的精神持续地在佛教艺术中体现出来。在每一个时代的石窟艺术中，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佛教和佛教艺术都是从印度、中亚等地传来的，最初敦煌石窟的营造免不了要学习借鉴外来的艺术。但敦煌是有着深厚中华文化传统的地方，敦煌的艺术家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总是要结合自身文化的特点进行改造和创新，使之适应本土文化。敦煌文化在每个朝代、每个阶段都有所创新。敦煌石窟艺术明确地反映出不同时代的风格特征。如北朝时期，在吸取印度、犍陀罗等方面影响的同时，又能接受中原甚至南方的艺术风格，并努力创造本土的风格样式；隋唐时代是文化艺术鼎盛的时代，艺术家辈出，同时期往往有不同的艺术风格争奇斗艳。从十六国时期到元代1000多年间，各时代的艺术风格又往往与当时一些著名画家所创的风格相关联，反映了敦煌与中原内地的密切联系。如在北朝壁画中，可以看到源自东晋南朝以顾恺之、陆探微为代表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人物画风格，唐朝壁画中分别反映出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等画家的画风等。今天，通过敦煌文化可以感受到千百年来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情、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便足以说明创新精神是推动敦煌艺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敦煌文化中，可以看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建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献中，不仅有汉文文献，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如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西夏文等。在敦煌壁画供养人画像中，不仅有汉族人物，还有鲜卑族、吐蕃族、蒙古族、回鹘族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可见敦煌文化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和广大少数民族人民一起建设和发展的，这一点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征。

包容性是敦煌文化最广泛的特征。佛教艺术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艺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艺术。在敦煌艺术中，不仅可以看到古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物形象和社会生活内容，而且从不同时代的石窟艺术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印度马图拉风格、笈多风格、中亚犍陀罗风格、古希腊罗马风格等域外艺术风格，同时也可看到中国新疆（龟兹、于阗）风格、南方风格、中原风格的壁画和彩塑艺术。文化的包容性，使敦煌艺术的创造者们不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那个时代创造新的艺术。敦煌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不只有佛教，还有众多其他宗教文化同样在敦煌发展。在藏经洞出土文献中，可以看到道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文化的资料，表明古代多种宗教信仰曾经活跃在敦煌。从语言文字方面，还有来自域外的梵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等方面文献。

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一直是以和平交往的形式，进行平等的交流互鉴，共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从汉朝到唐朝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繁荣，正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和平交往的见证。敦煌曾经是中国西部边陲的重要都市，很多来自古代中亚、西亚、印度等地的商人、僧侣、文人都曾在敦煌生活过，并留下了相关的文献和文物。在佛教的发展中，以法显、玄奘等为代表的历代高僧，不畏艰险，万里迢迢到中亚和印度取经，并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他们就是和平使者。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来自中亚、西亚和印度的文书，在莫高窟周边也出土了叙利亚文的《圣经》和景教的十字架。敦煌文献中还记载了关于从波斯、粟特、印度等地来到敦煌的外国人的行踪。这些历史文化遗存生动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与外国进行和平交往的历程。

总之，敦煌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敦煌的历史文化遗存（包括壁画、彩塑及其他文物）从具体案例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作者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接1版）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正在形成。但是，与科技创新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对应，金融供给还存在短板弱项。一是间接融资与科技创新的风险和收益不匹配。当前，以银行体系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约占社会融资规模的70%，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银行信贷天然寻求稳定收益，重抵押担保，但早期科创企业成果转化不确定，研发需要长期资金，现金流不稳定，往往不符合信贷条件，与传统信贷存在风险和收益难匹配的固有矛盾。二是直接融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我国股权融资的比重低，服务科技型企业的股权融资市场还不够发达。在股权融资内部，对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金融供给不够充分，创投行业“募投管退”各环节尚不顺畅，对硬科技领域项目投研能力不强。居民部门的金融资产配置偏好于短期资产，能够提供长期资金的保险和资管产品体量不足。三是政府性资金的投资和担保作用尚未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也存在盈利性需求，普遍面临短周期绩效考核，引导投早投小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与社会资本尚未形成各有侧重、错位竞争、接力式发展。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担保覆盖面窄，有的还有反担保要求，风险分担补偿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在地方财力偏紧的情况下，政府出资的风险补偿资金不足，难以撬动社会资本和信贷融资。四是鼓励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尚待完善。全国缺乏统一的科创识别标准、统计和评价体系，科创信息共享不充分。金融机构对科技企业的风险评估能力不高，内部考核和激励不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创新欠缺，金融监管对科技金融的适配性不够，制约了科技金融创新发展。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工作扎实推进

近年来，金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度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市场和制度建设，丰富金融工具和产品，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

科技金融政策的顶层设计不断建立健全。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框架，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

的工作方案》，推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制定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方案，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总体框架，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推动政策落地。优化科技金融区域布局，指导科技要素密集地区加强科技金融服务，鼓励济南、合肥、长三角、北京中关村等地在科创金融改革方面先行先试。

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政策工具更加精准。中国人民银行于2022年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等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重点领域技术改造项目的融资支持，带动银行发放相关贷款近2万亿元。2024年，在总结两项工具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完善，设立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深度融合“创新积分制”和产业政策标准，引导融资资源更加精准支持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首贷，以及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明显提升。过去5年，科技型工业企业贷款持续增量扩面：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年均保持30%以上的增速；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从14%提升至47%。科创类债券建立注册发行绿色通道，发行规模持续提升，科创票据累计发行突破1万亿元。服务科技创新的股权融资市场快速发展，超过1700家专精特新企业在A股上市，创业投资基金管理规模达3.3万亿元。

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模式日益丰富。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模式加快转变，“总部+区域科创中心+科技支行”的专业组织架构在大型银行普遍建立，突出企业创新能力和成长性的“技术流”风险评估模式获得广泛运用。适应科技型企业特点的科技金融产品不断涌现，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持续增量扩面，2023年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额同比增长75.4%，“创新积分贷”在国家高新区推广落地，“科技人才贷”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线上化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

科技金融配套政策进一步健全。稳步推进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外汇管理试点，提升科技型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度。各地金融部门与科技、产业部门密切协作，建立工作联动机制，搭建科技金融信息平台或服务专区，常态

化推送科技型企业信息，促进银企精准对接。不少地区设立科技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对科技金融产品创新给予财政奖补。

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点任务

科技金融的根本落脚点是促进科技创新的“用”，以科创企业和产业化带动科技研发，以金融支撑科创企业和产业发展，同时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聚焦科技金融服务的短板弱项和重点领域，加强政策统筹协调，丰富金融工具，优化市场机制，健全配套保障，综合运用贷款、债券、股权、保险等手段，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科技创新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

丰富完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与多元创新生态相对应，科技金融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涉及金融体系内部各类机构衔接协作、金融体系与科技体系相互配合，产生“1+1>2”的化学反应。要顺应科技型企业 and 产业培育具有较长周期、科技创新融资需求多元等规律，立足我国金融结构特点，支持大小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在依法合规、风险隔离可控前提下强化信贷、股权投资、证券、融资担保、保险等机构合作，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的接力式金融服务。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创新科技保险产品和服务。

加大对科技创新的信贷支持。最关键的是，优化信贷投向结构，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广度和强度。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对于“顶天立地”的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可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限、低利率的资金支持。对于“铺天盖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发放贷款予以支持。加强宏观信贷政策指导，推动银行构建相对独立的科技金融业务管理机制，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配的风险评估模型和业务流程，完善信贷额度管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绩效考核。优化科技

金融监管要求，建立标准清晰的差异化监管和尽职免责制度。

推动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高投入、高风险的长周期活动，股权投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特征天然适应科技创新融资需求，其中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在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独角兽科技企业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满足不同类别、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需求。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畅通创业投资的“募投管退”全链条，拓宽创业资金来源和退出渠道，提升创投机构综合性服务能力。

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功能。要发挥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功能，畅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等各环节，进一步发展股债混叠类的科创类债券产品，建立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高收益债市场，培育专业投资机构和评级机构，扩大科技型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加强科技金融基础制度和机制建设。除了金融系统自身能力建设，也需加强相关基础制度和机制建设，以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实现金融科技可持续性。继续优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小再贷款、专项金融债券等激励引导政策，健全科技金融标准体系，加强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应用，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服务模式和担保代偿的补偿机制，健全科技金融统计制度，扩大知识产权基础数据、企业研发活动信息等开放共享。

平衡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是推动科技金融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动金融机构落实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加快构建适应科技型企业特点的风险评估模型，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提高风险评估监测能力。落实金融管理责任，密切监测科技金融风险情况，强化对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预防和预警，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毕嘉宏，阿根廷知名汉学家，现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阿根廷—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并热衷于推动中拉人文学术交流。毕嘉宏以其对中华文明的深厚热爱，以及在中国研究上的学术成就，享誉中拉两地学界。

行稳致远的汉学研究之路

毕嘉宏对中国研究的兴趣起始于大学阶段。20世纪末，受中阿贸易持续增长以及中国移民在阿根廷不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部分学者对东亚研究的兴趣和重点开始从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议题上，并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大了对中国研究的投入。受此影响，当时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政治学专业学习的毕嘉宏，对中国问题萌生出浓厚兴趣，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与中国相关的各类书籍，并初步接触学习中文，从而开启了他的汉学研究之路。

大学毕业后，毕嘉宏到拉美地区的中国学研究重镇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继续深造学习，攻读中国研究硕士学位。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创建于1964年，是拉美地区最早开展中国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为毕嘉宏提供了丰富的专业学术资源以及深入研究的学习环境。据毕嘉宏本人自述，在墨西哥学院学习期间，周一至周五，他每天坚持学习4小时中文。同时在白佩兰等拉美汉学前辈学者的悉心指导和培养下，他进一步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专业书籍，并积极参加相关专业课程研讨。这段扎实的学习经历不仅丰富了毕嘉宏的学识、开拓了他的研究视野，也为他日后成为知名汉学研究专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到2007年从墨西哥学院毕业之际，毕嘉宏已发表多篇涉及中国传统儒学、中国现当代史以及当代中阿关系等内容的学术论文、书评等，在拉美汉学界锋芒初露。

从墨西哥学院毕业后，毕嘉宏没有停止他的求学探索之路，他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李侃如—罗格尔中国研究中心攻读亚洲语言和文化博士学位，专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为在研究中能够阅读使用中国古代一手文献史料，毕嘉宏克服困难，学习并研究了古代汉语，这也使他日后成为少数同时掌握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汉学家。2011年，他以中文撰写的《2009年西方学界中国出土文献研究论著简介》一文刊发于中国学术刊物《简帛研究》。以此篇论文为标志，随后毕嘉宏又以论文、述评等形式在中国、拉美等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涉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思想变迁、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论著，在拉美汉学界声名鹊起。

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不 忘关注当代中国问题

毕嘉宏在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 同时，也从未忘记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关注。他以史学研究为基础，开展跨学科研究，贯通古今，兼顾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做法，不但成为其自身重要的学术研究特色，也为他未来能够在中国研究领域持续深入思考夯实了基础。毕嘉宏认为，阿根廷史学研究长期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将“从希腊、罗马到基督教在欧洲地位的确立”，以及“近代以来欧洲向世界各地的征服、扩张”视作人类社会发最为重要的“普遍历史”，而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的历史，视作是一种具有“异国情调”和“陌生性”的历史文化，置于“边缘”或“被选择性遗忘”的地位。在这一偏见影响下，阿根廷多数青年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对中国的认知也缺少正确的信息。为解决这类问题，毕嘉宏在教学中一方面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通过生动有趣且富有深度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对 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另一方面，他讲授知识时注重对学生中文语言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以更为多元的视角去认识历史上的中国、理解当代中国。

毕嘉宏感佩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有较深的造诣。2017年，在“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支持下，他曾赴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研修访学。根据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实地访问与调查，结合收集到的相关文献史料，毕嘉宏极常见地地指出，上古时期中华文明“几乎在中国内部不同区域同时兴起”，经过“各地人群漫长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华文明发展成为一种“文化上多元”，但又具有较强“统一性”的文明体系。在毕嘉宏看来，历史上中华文明自成一体的发展路

兼顾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研究 阿根廷汉学家毕嘉宏：阿根 廷历史中国 与当代中国研究

□ 杨新新

径，也成为16世纪以来中西文明“相遇”后，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问题“充满困惑”的关键所在。

同时，毕嘉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固然是认识当代中国的重要方法和途径，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较之传统中国社会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要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各种根本性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历史有相应的了解和研究。因此，毕嘉宏从未放弃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思考。近年来，毕嘉宏提出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解放史诗对促进中国在21世纪的利益具有基础性和必要性”，中国政府目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拯救的是古老的文化 and 历史，而不是古老的政治制度”等一系列入木三分的洞见，无不显示了他对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史 的驾轻就熟，也反映了他对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二者辩证关系的深邃思考。

促进中拉人文学术交流

从密歇根大学博士毕业后，毕嘉宏先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国立萨米恩托将军大学、国立拉普拉塔大学为历史学、国际关系等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开设“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宗教信仰”“中国崛起与国际格局的重构”“东亚史”“亚洲史”等课程。自2010年开始，毕嘉宏多次来华留学访问，并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交流学习。毕嘉宏多次参加在中国、拉美以及西班牙、泰国等地举办的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出版多篇关于新时代中阿各领域发展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拉关系以及中国当代政治社会变迁等议题的论著。

2018年，鉴于当时拉美地区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较为缺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院东亚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毕嘉宏又发起成立了“阿根廷—中国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而“阿根廷—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后，毕嘉宏也坚持了他强调跨学科研究和贯通古今的做法，不但多次组织召开“从亚洲到拉丁美洲：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倡议”“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创新：对拉丁美洲的影响”等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联合其他学者合作编辑出版了涉及中国古代边疆历史文化议题的研究论著。

此外，他还推动中心积极与中国驻阿使馆合作，在阿根廷国家艺术博物馆等组织策划了“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中国古代的丧葬传统”等多场文博展览，丰富并发展了拉美地区汉学研究的内涵和形式，促进了中拉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与人文学术交流。

